

南京师范大学
古典文献研究丛刊

汉代《诗经》学史论

刘立志
著



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 高 天
封面设计 王铭基

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丛刊

方向东 孙诒让训诂研究

王 鐸 《礼记》成书考

刘立志 汉代《诗经》学史论

杨新勋 宋代疑经研究

序

《诗》三百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属于文学的范畴,这是当今研究古代文学的学人一致的说法。然而在古代就要复杂得多。首先,早在它结集时的春秋时代,《诗》三百就不单纯属于文学范畴,而是诗、乐、舞混而为一的文字载体。《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聘鲁,“请观于周乐”,即请乐工演奏《诗》三百的各个部分,而行文用“观”字,表明这是闻乐、赏舞、听诵三者同时进行的。所以,《诗》三百都可入乐,现在也已成为学人的共识。当然,春秋时期《诗》三百也可以声义分开利用。《左传》引《诗》一百八十条,多为取用《诗》之义,尽管其义多不合《诗》之本旨,是为引用者政治、外交或伦理所需而断章取义,但其时声与义可以分开显而易见。其次,由于孔子对《诗》三百的整理、编订、传授,到战国时代儒家开始将《诗》与《易》、《书》、《礼》、《乐》、《春秋》并列为“六经”,说明《诗》在儒家学派内部很早就完成了经典化的历程。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出现“焚书坑儒”事件,儒学受到重创,《诗》、《书》首当其冲,《诗》学研究也就中断。直到西汉惠帝废除“挟书律”,百家之学渐兴,“《诗》、《书》可以学”,文帝《除肉刑诏》中引用《诗》之语,贾谊能诵《诗》,韩婴、申培、辕固等人在文帝、景帝时因能《诗》而任职博士,说明《诗》学开始复兴。但由于当时帝王崇尚黄老之学,儒学尚未得到重视。至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五年(前136)专立五经博士,从制度上迫使士人必须学《诗》、《书》。后董仲舒对策又倡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此,研究《诗经》就成为一门显学。在此以后的两千多年中,《诗经》学蔚为大观,其著述之宏富,真可谓汗牛充栋。有人统计,仅20世纪一百年中,研究《诗经》的论著就有六千多篇部。

所谓《诗经》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诗》三百文本的研究,一是对前人的《诗经》研究成果的研究。从先秦到两汉,《诗》学主要是师生口耳相传,这就产生了师承关系,并形成各家不同的学说。在汉代,主要有鲁、齐、韩、毛四家,所以学人常以四家诗概括汉代《诗》学。对“四家诗”的研究就成为历代《诗经》学中的重要课题。此外,汉代相传在孔子住宅的壁中发现古文经书。《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古字,指汉以前的文字。于是称这些用先秦古字写的经籍为“古文经”,称用汉代通行的文字写的经籍为“今文经”。史书中记载汉初发现古文经书还有:张仓献《左氏传》,河间献王得古文先秦旧书,鲁三老献《古孝经》,鲁淹中出《礼古经》。汉代称这些都为“古文经”。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后来今古文之论争一直不断。本来汉代并未发现古文本《诗经》,但由于有人认为今古文的区别不在文字,而只在于经师说解的学术差异导致了今古两家的分野,于是《诗经》也被卷进了今古文经学的论争之中。章太炎《经学略说》云:“《诗》无所谓今古文,口授至汉,书于竹帛,皆用当时习用之隶书。《毛诗》所以称古文者,以其所言事实与《左传》相应,典章制度与《周礼》相应故尔。”又《述今古文之源流及其异同》云:“《诗》不应有今古之分,盖三百篇遭秦而全,以其里巷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所谓今文者,即鲁、齐、韩为三家,鲁申公为训故,齐轵固、燕韩婴皆为之传,《韩诗》最后出,三家皆列于学官。同时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自谓得子夏所传,其序与《左传》、《周礼》相应,故称古文。”鲁、齐、韩三家诗为今文经学,《毛诗》为古文经学,成为学术界多数人的看法。当然,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说法。所以今古文之争也成为历代《诗经》学研究中的重要论题。

以上所说的许多问题都源自汉代,为此,研究汉代《诗经》学史,必须承担起釐清并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艰巨任务。

刘立志博士1996年大学毕业后,即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999年以《先秦引〈诗〉研究》为题的毕业论文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又考取博士研究生,进入余之门下继续攻读先秦两汉

文学。在读期间学习非常勤奋,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各门课程成绩皆为优秀,其对《诗经》学的钻研尤为深入,三年中遍览相关论著,搜集大量资料,排比梳理,最后完成了这部博士学位论文《汉代〈诗经〉学史论》。

刘君此著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从学术史的高度考察了汉代《诗经》学的源流、学派承传、地域流播等问题。如溯源先秦《诗》学对汉代《诗经》学的影响,指出孔子强调《诗》之功用,认为既可为上达视听、谏君预政之工具,又可为个人修身进德之工具,这就决定了其对《诗》三百的阐释并不贴合篇章文字。而孔子以兴喻作为用《诗》、解《诗》方法,使汉人对《诗》三百的阐释集中在衍申出的庄严主题上,妨碍了对《诗》本义的保存与发掘。指出孟子发展孔子的“思无邪”而以仁义统贯《诗》三百,并用“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影响汉儒的解《诗》。还指出汉代《诗》学与荀子有师承关系,《鲁诗》、《毛诗》由荀子所传,《韩诗》亦可能与荀子有渊源关系,汉代通《诗》致用乃受荀子《诗》学之影响等等。这些论述都从思想文论的发展和学派传承等角度切入,材料翔实,故立论都坚实可信。再如论文从考察文化背景、儒学规范化、教育经学化、选官向经学倾斜、帝王的推行等,论定《诗》学经化史历程实为历史化、政治化历程,汉儒对《诗》学阐释始终自觉服从政治伦理规范和实用价值,从引《诗》断狱到引纬断事再到世人对经书的神化,政治都是起支配作用。作者考察了汉代《诗》学的阐释原则及其演变轨迹,指出汉儒解《诗》注重文字疏通,与比兴方法配合运用,构建了自足的《诗》学阐释体系,为发扬儒家诗教作出了巨大贡献。又如对今古文经学和四家诗的论述,也都置于学术发展史的过程中考察和论述,从文字版本、时间和地域限定等角度,分析今古文两派的消长过程,从著述体式、《诗》学传承阐述《诗经》学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演进,都具有创造性和启发性。

刘君此著的第二个特点是文献考据和理论思辨相结合,提出了许多与前人不同的创新见解。如前人都认为《诗经》没有先秦古文本,刘君根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的记载以及北宋郭忠恕《汗简》所征引的“古毛诗”文字与出土的战国简帛文字相同,经过细密的稽考和论

证,考明《毛诗》确有先秦古文本。并指出古文与今文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字体形式上,但字体之古今并非确立今古文经学的标准,区分今古之学的分野在于学说思想的差异,包括对文字的训释、诗篇创作背景及作者的认定、典章名物的疏解等等。又如前人都从师承关系确定《诗》说学派,刘君根据各典籍记载转辗考证后指出,汉代研究《诗经》的学者未必仅通一家之学,如汉昭帝既从蔡义治《韩诗》,又从韦贤习《鲁诗》;《百越先贤志》记载,澹台敬伯受韦氏《诗》于淮阳薛汉,韦氏《诗》属《鲁诗》,而《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薛汉习《韩诗》。刘君认为由其人师从之学单线条地确定其诗派,或由其家学渊源论定学者的《诗》学流派,都不免失于简单化。如司马迁曾问学于孔安国,而据《汉书·儒林传》孔安国所习为《鲁诗》,故前人都以为《史记》引用《诗》为《鲁诗》,实际上司马迁引《诗》异说并存,非仅限于《鲁诗》一派。又如前人均以刘向为楚元王交之孙,元王从浮丘伯习《鲁诗》,遂定刘向为《鲁诗》学派,实际上刘向好古,其《诗》学兼通诸家。前人认为郑玄是汉代融合今古文《诗》学之第一人,刘君稽考《说文》,发现许慎兼通鲁、韩《诗》学,征引谶纬之说,综合和融合今古,是比郑玄更早融合今古文《诗》学之人,否定了前人成说。这些崭新的见解,都是建立在大量文献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排比考证得出的结论,故有很强说服力。

刘君此著的第三个特点是遵循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充分运用纸上的材料(文献典籍)与地下的材料(石刻和简帛)结合研究。如论述孔子《诗》学,不仅运用《论语》等文献,还引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行》与战国楚简《孔子诗论》,深入揭示出孔子《诗》学对汉代《诗》学的重大影响;再如论述汉代《诗》学与民俗文化时,引用了大量出土的汉代碑铭,如《孟孝琚碑》、《赵宽碑》等,有力地证实了汉代民间学《诗》之盛;又如在探研四家诗传本异同时,引用阜阳汉简《诗经》、尹湾汉简《神乌赋》以及熹平石经的许多材料,充分说明四家诗的文本差异包括文字和篇章次序。通过二重证据法的运用,使本书提出的许多新论点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刘君此著的第四个特点是点面结合,既有宏观的系统概论,又有

微观的个案研究,如对《诗》学经化史的过程和汉代《诗经》学的发展与演进,多为宏观叙论,而第一章论孔子、孟子、荀子与汉代《诗》学,以及第四章论司马迁、许慎、东汉中后期《诗经》学者群体等都属个案研究,显示出本书对《诗经》学各个层面的关注甚广,举凡渊源、今古文、学派流变、《诗》学与汉代文化等各个层面均有论及,视野广阔,创获颇多。但不求面面俱到,如对熹平石刻的原委、《诗序》的时代、郑玄学派的兴衰等,或缺乏新材料,或难于创新,本书就未加论述。当然,作为一本综论汉代《诗》学的专著来说,这可能是有些缺憾,但不知为不知,宁阙毋滥,这也未必不是具有确立新范式的意义。

总之,刘君此著对汉代《诗经》学的一些主要问题都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与前人不同的创新见解,足供学界参资。而其主要功力,在于搜辑材料的广泛,排比考证之认真踏实。如史籍所载汉代帝王诏敕中引《诗》之句,古今学人对今古文区分的意见、汉代《诗》学的著述、东汉《诗经》学者的学行和汉碑所见墓主的学行等,都列表说明,尤其是书末附录的汉代《诗经》学者图表、汉代《诗经》学著述考补、汉代《诗》学大事年表,可以看出作者用力之勤,这些都为学人进行后续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若说刘君此著的缺点,窃以为主要是引用材料过多,不忍割舍,影响到行文的流畅。若能进一步删芜存精,可能使此著更为增色。值此著作付印之际,略陈鄙见如上,聊以为序。

郝贤皓

2006年12月20日于金陵寓所

目 录

序	郁贤皓(1)
引论	(1)
第一章 汉代《诗》学基调的奠定	(16)
第一节 孔子与汉代《诗》学	(16)
第二节 孟子与汉代《诗》学	(23)
第三节 荀子与汉代《诗》学	(33)
第二章 汉代《诗》学经化史的系统考察	(42)
第一节 由诗到经:儒学规范的确立与强化	(42)
第二节 《诗》学阐释的旗帜:政治化	(58)
第三节 《诗》学阐释原则的确立与演变	(63)
第三章 汉代《诗》学经学史的系统考察	(71)
第一节 今古视野下的四家诗——以《毛诗》 之归属为中心	(71)
第二节 从著述体式看汉代《诗经》学的发展与演进	(93)
附:汉代《诗》学著述略表	(107)
第三节 汉代四家诗学传承探研	(110)
第四章 汉代《诗经》学者个案研究	(119)
第一节 司马迁之《诗经》学	(119)

第二节 许慎之《诗经》学	(126)
第三节 东汉中后期《诗经》学者群体考察	(135)
附:三家诗辑佚学派论定之批判	(147)
 第五章 汉代《诗》学与汉代文化	 (162)
第一节 以《诗》治狱的文化考察	(162)
第二节 汉代《诗》学与民俗文化	(170)
第三节 《诗》学与汉代文学	(178)
 附录一 汉代《诗经》学者图表	 (182)
附录二 汉代《诗经》学著述考补	(192)
附录三 汉代《诗》学大事年表	(211)
主要参考书目	(219)
后记	(225)

引 论

一、本课题的学术意义与研究方法

《诗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中的重镇之一,其内涵包括《三百篇》文本研究和学术史考论两个方面。无论立足于哪一点,汉代《诗经》学都是不能绕过的关键一环。删《诗》说、兴谕说、变风变雅说、诗旨阐释、《毛传》、《郑笺》、今古文,等等,皆由汉世学者生发出来引入学术领域,进而成为《诗经》学的重要范畴与命题,后世学人研治《诗经》亦无不由此切入。职是之故,汉儒之《诗经》学历来见重士林,学者前赴后继,代有名家,著述成林,取得的成绩斐然可观。清理前人的业绩,取其精华,在扬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已经成为当世学人的共识,这也是《诗经》研究的当务之急。本课题即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系统探研汉代《诗经》学之源流,深入剖析其发展脉络,全面考辨其解说特色,以期对汉代《诗经》学做一整体把握。

学术课题的研究方法应该与特定的研究对象相适应。汉代《诗经》学研究积累宏富,基础雄厚,跨越文本与学术史两个领域,对研究者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鉴于宏观研究难以面面俱到,或不免于略而不明;微观研究又为选题所限,失之于琐屑而不够贯通,本课题兼用宏观探研与微观考察两种方法。二者结合,既能使研究立足于较高的学术基点,避免“一叶障目”的弊病,也能从细微处入手,以微显著,见微知著,避免空疏的论述,还能保证课题提纲挈领,全方位考辨汉代《诗经》学术发展与流变,使课题兼有史的角度与深度。再者,《诗经》学史的探研与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等诸多领域密切相关,纠缠不清,

诸如汉代《诗经》学术的社会影响、经学与文学的分合、汉代学者思想观念的演变等,牵涉层面较为广泛,不能将其孤立开来考察,否则势必流于空泛肤浅。因此,本课题考论,文史结合,兼顾文献辨析与社会思潮考察,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切入剖析。

方法之外,推陈出新也必须借助新材料,近年的文物考古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也是我们远较前贤幸运之处。本课题参考考古发现的大量简帛资料,举凡马王堆汉墓帛书、阜阳汉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汉代碑刻等,皆纳入视野,追踪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以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对比印证发明,力求对汉代《诗经》学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二、汉代《诗经》学研究的回顾

中国传统学术中,经学居于学科之首。《诗经》学是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古人所重自不待言。儒家十三经中,《诗经》又因文学色彩与意味最为浓厚,其研讨关涉经学与文学两大领域,因此古往今来,学风转移,《诗经》研究却一直保持着兴盛的势头。在旧学衰亡,新学兴起之后,其他十二经的研究颇为冷落之时,《诗经》研究依旧是熙熙攘攘,名家辈出。20世纪,一百年中,出版的相关著作、发表的相关论文数以万计。寇淑慧编有《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一书,仅著录书名篇题及出处,即达四百五十余页,六千余条。其中漏收者为数不少,如港台学者的成果即较少著录。前人的成果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横向或纵深的坐标轴中对《诗经》学史进行考察。而汉代《诗经》学是历代《诗经》研究中的重要一环,经学史意义极其突出,自然是学人注意的焦点所在。

汉代《诗经》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

宏观研究是对汉代《诗经》学进行整体鸟瞰。汉代《诗》学的宏观研究缕析如下:

晚清民国以来,有不少经学史及相关著作相继问世,先后有:

蒙文通《经学导言》(1923 年)、《经学抉原》(1933 年)

皮锡瑞《经学历史》(1928 年)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1936 年)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1936 年)

[日]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1927 年完成,江侠庵有节译本,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孙俚工译本由中华书局 1934 年出版)

蒋伯潜、蒋祖怡父子合著《经与经学》(1942 年)

甘鹏云《经学源流考》(1977 年)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1982 年)

章权才《两汉经学史》(1990 年)

赵吉惠、赵馥洁、郭厚安、潘策主编《中国儒学史》(1991 年)

何耿镛《经学概说》(1984 年)、《经学简史》(1993 年)

杨成孚《经学概论》(1994 年)

汤志钧、华友根、承载、钱杭《西汉经学与政治》(1994 年)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1996 年)

王葆玟《西汉经学源流》(1994 年)、《今古文经学新论》(1997 年)

夏传才《十三经概论》(1998 年)

李景明《中国儒学史》(秦汉卷)(1998 年)

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2001 年)

晋 文《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2001 年)

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2001 年)

张 涛《经学与汉代社会》(2001 年)

孙 筱《两汉经学与社会》(2002 年)

边家珍《汉代经学发展史论》(2003 年)

这些著作都对汉代经学发展的概况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探研,行文及于《诗经》研究,探讨了汉代《诗经》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今古之争、学派传承、《诗序》真伪等等。尤其应该在此提出的是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附录一论述《春秋》《诗》《孝经》《礼》在汉代政治地位的转移,高屋建瓴,独具慧眼,令人拍案。但诸书因为体例所限,《诗经》学考察部分大多文字简略,述多论少,未能将点面结合起来作深入

研究。它们的长处在于将汉代经学置于整个经学史的历程中进行考察,凸显出汉代经学的特性,于中也就不难察见汉代《诗经》研究的时代特色。

相比而言,《诗经》学史专著考察更为深入。个人目力所见,这类著作有:

胡朴安《诗经学》(1928年)

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1982年)

黄振民《诗经研究》(1982年)

韩明安《诗经研究概观》(1988年)

赵沛霖《诗经研究反思》(1989年)

鲁洪生《诗经学概论》(1998年)

吴万钟《从诗到经——论毛诗解释的渊源及其特色》(2001年)

戴维《诗经研究史》(2001年)

刘朝谦《汉代诗学发微》(2002年)

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2005年)

诸书都是紧扣《诗经》学史大作文章。胡氏书二十一节,言及《诗序》、六义、三家诗等,设有“两汉诗经学”一节,虽较为疏略,但筌路蓝缕,功不可没。夏氏书以时代分,有《汉学〈诗经〉研究的斗争与发展》一章。戴氏书亦以时代为序,分别介绍。韩氏书设置了两个部分,一为《诗经》研究中的主要争议,论及《诗序》、赋比兴、四诗说等,一为《诗经》研究资料编目。赵氏书分为四部分,一依诗篇内容分类叙论,一以《诗经》学相关问题为中心,横向纵向结合论说,一介绍历代学人著作,绎介其价值,最后是“《诗经》研究展望”,对于深化《诗经》研究提出了几点设想。黄氏之书专以《诗》学基本问题为中心,如诗篇之命名及排列次序考、六义考释,颇富专题性质,关涉汉代《诗经》学术者有一篇,即《汉鲁、齐、韩、毛四家诗学考》,稽查史籍,纲举目张。鲁氏书颇类学案,第六章为“两汉《诗》学”,包括八节,内容涵盖四家诗源流、《毛传》独传的原因、郑玄说《诗》、关于《毛诗序》的几个问题等,综列古今各家之说,间出己意。吴氏书分为六章,专就《毛诗》说解发论,论及先秦引《诗》与《毛诗》解释、兴的思维模式与《毛诗》解释、语言环境

与《毛诗》解释及《毛诗》说解的特色等。汪氏书也有专章探研汉代经学背景下的《诗经》文学阐释,言及《毛传》、《郑笺》与《焦氏易林》及独标兴体、风俗观《诗》诸多问题,视角比较新颖,立论不乏启发性。刘氏书所称之“《诗》学”乃泛指,涵括楚辞、汉赋等文体,涉及汉代《诗经》学的有一章,论述汉代《诗经》与《诗》学,着眼于《诗经》对汉代文学的影响。这些著作,资料搜集宏富,博中见精,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出入古今,脉络分明,各具特色而多有新见。但它们对于汉代《诗》学多选择特定角度切入,终究缺少综观一代《诗》学风貌之阔大气象。

能够点面结合,述论相当,研讨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汉代《诗经》学研究专著,笔者所见,仅有两部,即北京大学常森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诗〉的崇高与汨没:两汉〈诗经〉学研究》(1999年)与谭德兴专著《汉代〈诗〉学研究》(2003年)。常氏论文全面研究汉代《诗经》学,突出其特征,纠摘其偏失,注重考察汉代《诗》学文本,系统探求《诗》三百经典化的历程,剖析汉儒说《诗》原则及其文化历史根源,许多说法可成定论,如谓汉儒将《诗》经典化的具体手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背离文本,在儒学范围内推演,并把儒学观念“注入”经文之中;二是借助类比,把《诗》作为阐释儒学观念的喻体;三是以美刺之说,赋予诗作以“扶持邦家”的政教伦理功能。此文又谓《诗》三百处于巫医、巫药传统与中医、中药传统之间,但后人在阐释之时,将其中所见植物以及其他鸟兽虫鱼普遍解释为以信仰为根基的巫药,或是以日常经验为根基的中药,这显然会背离诗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诸如此类,胜义颇多。常氏此文详于文化阐释,深于义理发论。

谭氏书包括八章,视野遍及两汉学风与《诗经》传授、《春秋》学与汉代四家诗、情性与两汉《诗》学观之突破、两汉《诗》学理论、两汉《诗》学方法、两汉《诗》学与文学等。全书框架宏大,论说细致,正如作者在绪言中所说:“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是以两种《诗》学观——经学《诗》学观与文学《诗》学观看汉代《诗》学。本书从经学、文艺心理学、文学、语言学以及文化学等视角,紧紧围绕两种《诗》学观对汉代《诗》学内容及其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剖析。”行文之中,时有新意,笔者在对旧作进行完善增补之时从中受益颇多。

汉代《诗》学的微观研究可以分作三类：学派研究、学人研究和其他个案研究。学派研究是对齐、鲁、韩、毛四家诗学的研讨。其中《毛诗》研究主要包括《诗序》和《毛传》研究两个方面。《诗序》对于理解诗旨关系重大，而后人不满其说解迂曲，不能洞微索隐，直指文心，以至讼争不休。或主尊序，或倡废序，宋人发其端，后人扬其波，角力相争，历元明清而不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谓《诗序》问题为“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对《毛诗序》的研讨主要分两方面，一是考辨其作者、创作时代，一是研讨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影响。关于《毛诗序》的作者，胡朴安《诗经学》归纳有十三说，张西堂《诗经六论》总结为十六说，周予同《群经概论》罗列有十二说，蒋善国在《三百篇演论》中总括为八家。关于作者身份问题，学界尚未论定。由此影响到对其创作时代的考订，溯前者推至战国中期，延后者谓迟至后汉晚期。古今学人或是把《诗序》作为一个整体对待，或是将它分割成不同的部分进行考察。无论是分成大序、小序，或是分成大序、古序、续序，还是分成首序、续序，分割考察在方法论上无疑是正确的。现在多数学者认为《诗序》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始创于先秦时人，两汉人续为增益。这方面的重要论文有王锡荣《关于〈毛诗序〉作者问题的商讨》^①、曹道衡《试论〈毛诗序〉》^②、马银琴《从汉四家诗说之异同看〈诗序〉的时代》^③等。由于资料有限，各家立论大多从行文风格、用语特点、礼乐观念的变迁诸方面切入，因为找不到坚实的落脚点，争论也就缺乏统一的根据。对立双方都没有能够驳倒对方的强有力证据。现在，上海博物馆购得之战国楚简为《毛诗序》渊源甚早的观点提供了新的力证。楚简《孔子诗论》中有性质与《诗序》类同的文字，如第八简云：“《十月》善諝（譬）言。《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小旻》多疑矣，言不中志者也”，第二十三简云“《鹿鸣》，以乐词而会，以道交见善而傲，终乎不厌人”。孔子的这些论诗语句与《诗序》应该有

① 《文史》第10辑。

② 《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

③ 《文史》第5辑。

一定的渊源,作为《诗序》早出的证据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孔子诗论》与《诗序》尚多中间环节需要详细考察。研究《毛诗序》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影响的论文极多,概括来说,大多认为《毛诗序》建立了中国诗学政教传统,其优点是使诗歌、诗人创作充分关注现实,不足是对诗歌艺术成就产生了妨碍作用,兹不详述。

关于《毛传》的研究则集中在对其体例的研讨。萧璋撰有系列论文《谈毛传解说诗句》^①、《毛传条例探原》^②,冯浩非则有《毛传要例阐微》^③、《毛传要例索隐》^④等,都提纲挈领地论述了《毛传》释《诗》的渊源及训释规则、特定用语等。对于《毛传》的义理,学人也有所论述,如魏源《诗古微》中有《毛诗明义》五篇与《毛诗义例篇》^⑤;刘师培《毛诗荀子相通考》^⑥即谓荀子释《诗》与《毛诗》相合者甚多,此乃毛公受业荀卿之门所致,《毛诗》当出于荀子。自清末至今有几本研究《毛诗》的专著,如陈奂《诗毛氏传疏》,笃守《毛传》,考据详明,引证赅博;马其昶《毛诗学》三十卷,训诂以《毛传》为宗,并兼采众说,疏通证明,以明《诗》之大义;丁惟汾《诗毛氏传解诂》,以声音解说《毛传》训诂之理,间亦取资方语;陈应棠《毛诗训诂新论》,以声训、形训、义训、名训四类评论《毛诗》之训诂体例,举其训诂条目凡七十三项,比例统类,深入研讨;冯浩非《毛诗训诂研究》,也是就《毛诗》训诂发论,等等。

三家诗亡佚较早,仅有《韩诗外传》流存至今,因此三家的研究远较《毛诗》为迟滞。《韩诗外传》的研究成果较多。1962年台湾师范大学赖炎元撰有博士论文《韩诗外传考征》(未见),后又出版有《韩诗外传今注今译》一书,进行了初步校勘与疏证。1979年徐复观出版《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其中有一部分题为“韩诗外传研究”,对其书进行了系统的探研,涉及其基本思想观念、诗教与诗传问题、各家诗说的根

① 《文献》1986年第4期,1987年第1、2、3、4期。

② 陆宗达主编:《训诂研究》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4月。

③ 《文献》1988年第2期。

④ 《文献》1989年第2期。

⑤ 魏源:《诗古微》,何慎怡校点,汤志钧审订,岳麓书社1989年12月。

⑥ 《群经大义相通论》,《刘申叔遗书》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3月。